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喻权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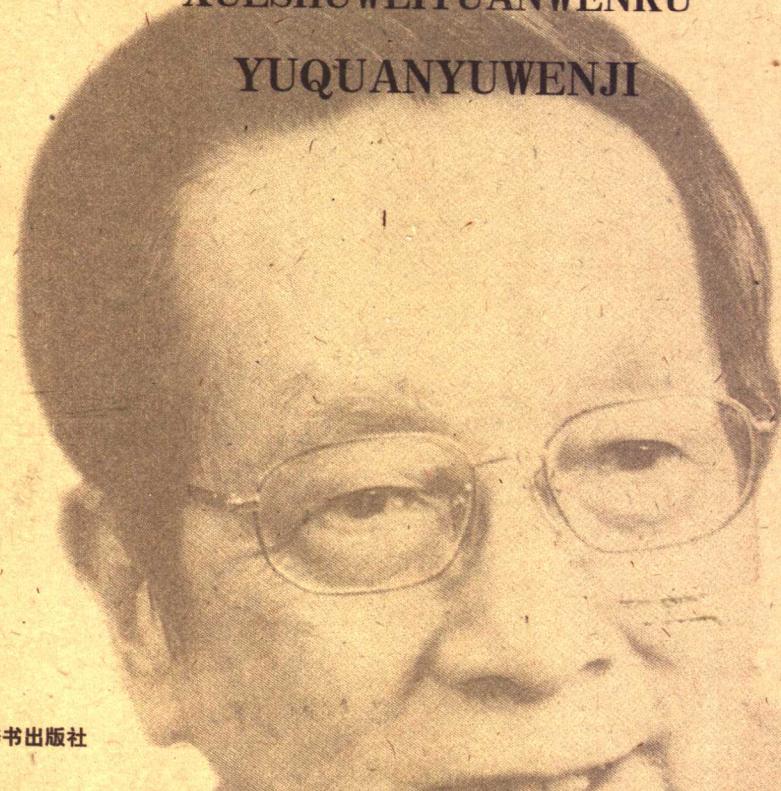
喻权域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YUQUANYU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喻权域

喻权域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YUQUANYU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RBB10/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权域文集/喻权域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793-9

I. 喻... II. 喻...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73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康萍 朱莘莘
装帧设计 姜明 明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喻权域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9.375 插页 8 字数 468 7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793-9/K · 311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 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W.H. Lee

喻权域

小传

喻权域，1935年9月生于四川省荣昌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高级编辑，研究员。

1950年1月肄业于重庆树人中学高中部。3月，多报三岁参加革命，到成都附近的新繁县农村工作。1950年12月任新繁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主任科员（负责全科工作），组织领导全县农业、水利、交通、工业、邮电等经济建设事业。

1952年9月调任中共新繁县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及政策调研工作。当年12月，参与创办四川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新民社。1954年发表通讯《快乐的女社员》，并出版同名的报告文学集。

195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1956年采写通讯《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水稻会减产》，受到批评。1957年因此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当“右派”下放劳动的21年间，自学了大学文史哲经课程和英语，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文革”后期研究都江堰创建史，写文章提出了“开明肇其端，李冰集大成”的新说，1976年后陆续发表。

1978年6月恢复新华社记者职务，去农村调查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1月13日，发表《打碎“左”的枷锁，才有农业高速度》一文（与

黄廷骏合作),经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等大报刊于头版头条,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新华社通报表扬。其后,奉命去南方四省、东北三省采访调查,发表了一系列“纠左”、纠正“以粮为纲”的文章,被国家农委汇编成小册子,发全国各公社、大队学习。

1979年12月奉调到北京新华总社,参与创办《半月谈》杂志,任主编。其发行量在1982年达到380万份,成为全国之冠。

1982年9月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组织指挥新华社的国内新闻报道和内参报道。1987年奉命率七名新华社记者调查研究,为党的十三大提供《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书面表扬。1984年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主编出版《台湾的昨天与今天》、《走向国际市场》二书。1987年12月被评为“高级编辑”。

1988年4月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

1989年9月任《人民日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1991年10月发表长文《论三个时间差——与工程师们谈社会主义》,全国有24家党报党刊转载。其后,将此文扩充为20万字的专著,获文化部等四部委奖状。此书第二版获“吴玉章奖金”。

1993年9月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秘书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组建中国人权研究会被选为副会长,着重研究人权问题,参与人权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国际舆论斗争。主编《中国人权丛书》(四本)并撰写其中的《人权问题纵横谈》一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1996年10月至1998年10月,专职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论文《世妇会报道对新闻学传播学的启示》获“中国新闻奖”论文一等奖。

1998年3月开始,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1998年10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

自序

经常有社会科学界的朋友向我发问：你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可是你不只是写新闻作品和新闻学方面的文章，你在史学、法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写的论著更多，你究竟算是“哪一家”？

我回答：我算是个“杂家”吧。党、国家和人民遇到什么新的重大的问题，我就研究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这样就一步一步地成了“杂家”。

搞新闻工作，特别是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这样的新闻单位工作，任务是繁重的。要处理国内国际的各种新闻报道，要宣传、解释、回答读者的各种各样问题，还要给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提供咨询和意见，这就需要“杂学”，需要各方面的知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也有许多方便条件：能接触到国内国际的大量信息和资料，可以到任何机关、单位和行业去采访、调查，可以向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学者、专家请教，使自己成为“杂家”。

我并不以“杂家”为耻，还以“杂家”为荣。今天这个世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因此，社会科学的门类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专家的优势是对他那门学科钻研得较深，掌握的知识较多；但是，这一门学科的专家，在另一门里可能是“外行”。这就需要杂家了。杂家的缺点是对每一门学科都钻研得不深，不能讲得很清楚；优势是对好几门学科都知道其

大概，甚至是好几门学科里的“半专家”。遇到涉及面广的问题，遇到同一学科里发生激烈争论，杂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所以，社会既需要大量专家，也需要一些杂家。

我的兴趣广而知识不广，更不深厚。我的自我评价是“浅薄而不狂妄”。我写文章、发表意见，遵循孔子提出的一条原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只讲自己作过调查研究、弄懂了的问题，只发表自己有把握的意见和主张，所以，反对我、讨厌我的人虽多，他们至今没能在我的文章里找出重大的谬误。

老了来编《自选集》，我发现我写的大部分文章是辩论性、论战性的。除了 20 世纪 70 年代写的关于都江堰创建史的争论文章外，多数辩论、论战是围绕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内国际的形势发展和重大问题而进行的。有些问题的争辩，至今仍未结束，甚至更加激烈。

由于我参加的争辩、论战较多，要简单讲述那些争辩和论战的起因、背景、过程和效应，也得花很多笔墨。本书的篇幅有限，我还是免了吧。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的读者，自会看出其脉络。

这里只想谈谈争辩、论战和文风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形成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在先秦诸子中，孟夫子是好争辩的，但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似乎“好辩”是一个缺点。

我赞赏荀子和邓小平同志的话。荀子说：“君子必辩。”邓小平说：“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①

“君子必辩。”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党和国家遇到重大问题，只有通过内部的或公开的讨论、争辩，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学术见解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只有通过自由而平等的争辩、论战，才能判断。

“君子必辩！”辩论能增长自己的学识，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发

现和改正自己的缺漏，丰富和完善正确的见解。毛主席说得好，“不破不立”。新的、先进的思想理论，都是在与旧的、错误的思想理论进行论战中而形成的。

众寡悬殊、以少对多的论战，最能锻炼人，最能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1990年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借“人权问题”围攻我国。我们组织起中国人权研究会来研究。我国学者收集世界上从古至今关于人权的论著，编印了七大册；又编印了《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两大厚本，共计3300多页。联合国的官员看了大为惊异，说是比联合国收集的关于人权的文献资料更多、更全。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研究了人权的思想、理论、约法，研究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了新的、系统的人权理论和主张，出版了成套的论著。从此，我国学者在国际人权论坛上就占了上风，美国那些反华的“人权卫士”简直不是对手。

我自知学识浅薄，每一次提出新见解，撰写重要文章，都采取“三步走”。第一步，对熟悉的朋友、同事和有关人员作口头讲述，与他们共同切磋。通过这种面对面的讨论和争辩，修正错误，弥补缺漏，丰富和改进自己的论点。见解大体成熟了，走第二步：写出文章初稿，广泛征求意见。我结交的诤友甚多，有权威的大学教授，有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有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群众、普通职工。他们知道我征求意见是诚恳的，所以他们不客气地在我的文章上大批大改，或提出疑问和批评，或作增补。我把这些意见汇总，择其善者而从之，仔细修改我的文章，然后才走第三步——公开发表。

1991年我写《论三个“时间差”——与工程师们谈社会主义》一文，曾送请二十多位老、中、青朋友修改过两遍，才于7月31日发表。当时，全国有二十多家报刊全文转载。其间，我又作了些修改。收入本书的这篇文章载于《理论参考》，算是定本。时间已是当年的

12月10日。那半年间，各报刊转来了上千封读者来信。我认真读了这些信，根据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增补了大量材料和内容，扩充为一本近20万字的专著《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出了两版。

因为我写的文章大多是给广大普通读者读的，我用的是大白话，摆事实，讲道理，偶尔还穿插些有趣的事。我不用深奥难懂的词汇，更不生造新词句。我的文章中很少大段引文（指名道姓的论战文章，则引用对方的整段言论，以免断章取义，歪曲对方的原意），连马恩列斯的语录也引用得不多，只在非引用不可的时候才引用。文末也没有附上大篇注释和文献资料目录。

这算不算学术文章、学术著作呢？1996年，几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推荐我写的《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一书（增补版）去申请“吴玉章奖金”，我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所敬重的学者邓力群、王忍之、吴树青、陶大镛、胡代光、有林、黄楠森等都说：我们喜欢你的文风。我们认为你那些深入浅出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是学术文章。外行人一看就懂，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写的。我们赞成把“吴玉章奖金”发给你。今后，你就继续按你的方式写吧！

他们特别强调：什么是理论？理论就是条理化、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或者说是理性认识的条理化和系统化。什么是学术？学术就是有系统的、比较专门的学问。你的文章符合这些要求。

从那以后，我就继续按我的方式来研究问题，撰写文章。1996年秋天我61岁，被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专职（以前是兼职）担任新闻研究所所长，仍然保持我的学风、文风。是否有当，请读者评判。

今日中国又面临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调查研究以找出解决的办法。我离开新闻单位十年了，没有条件去基层作深入的调

查。我年近七旬，精力衰退，难以作系统的研究。我只有寄希望于中青年学者。

喻权域

2005年3月

注释：

- ①《邓小平年谱》上卷，第160页。

目 录

自序 1

历 史 学

二郎擒龙的神话与开明凿宝瓶口的史实 3

经 济 学

吹响农村“纠左”的号角 25

打碎“左”的枷锁 才有农业高速度

——四川省宜宾县下食堂大队综合发展农业副业工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5

社队干部要有经济头脑

——四川省宜宾县下食堂大队综合发展农业副业工业的
经验 42

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非走不可

——川、黔、湘、苏四省农村见闻观感 49

值得探讨的一些有关经济理论问题

——川、黔、湘、苏四省农村见闻观感 56

为无锡县的社队工业声辩 63

怎样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68

择优·竞争·联合 73

退休金需要社会化	76
两个公式 两种经营思想	78
农业的下一次飞跃要倚重家庭农场	
——访四川省新都县几个种田大户有感(上)	81
家庭农场的要求正是农业现代化	
——访四川省新都县几个种田大户有感(下)	88
经济效益与“向钱看”不能划等号	94
恼人的土地问题	96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04
与英国经济学家讨论“私有化”	109
中国不可照搬西方经济学	
——记西方两位经济学博士的谈话	114
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300 美元”	123
读世界银行 1992 年报告	130
想起了“崽卖爷田心不痛”	144
国有企业最需要“国民待遇”	150

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学与历史学是姐妹关系	161
定义的公式与新闻的定义	163
“最近”与“今天”	
——谈新闻报道的时效问题	171
再论“非事件性新闻”	187
报纸上不可缺少现场短新闻	201
新闻记者的修养	204
记者的调查研究	220

新闻编辑的基本修养	238
论总编辑负责制	253
世妇会报道对新闻学传播学的启示	
——在世妇会新闻报道研讨会上的发言	261
办报办刊要一心想着读者	
——《半月谈》创刊初期编辑工作回忆	274
论“政治家办报”	281
与香港同行谈我们对新闻工作的基本看法	
——在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北京研讨班的讲稿	287
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开幕词	297
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	302
谈新闻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310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333
对理论建设和理论队伍建设的看法与建议	338
马克思提出过“工人日益贫困化理论”吗？	356
论三个“时间差”	
——与工程师们谈社会主义	370
访美归来 更有信心	406
俄罗斯的忧郁还漫长	415
《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永放光辉	450
中共党史的主体应该是什么？	457
端正学风 促使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460

法学·哲学·政治学

说“对话”	469
-------------	-----

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	475
“人权卫士”为何怕谈生存权？	478
政府可以不过问人民的生存权吗？	481
中美两国人权状况之对比	
——在中美关系讨论会上的发言	483
争人权就是反特权、争平等	491
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501
中华文明的回顾与前瞻	540
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	567
驳西方反华势力在民主问题上对我国的攻击	572
不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我国宪法	593